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编年史（上）

Chronicle of Modern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俞樟华 等 编撰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 编年史（上）

Chronicle of Modern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俞樟华 陈含英 编撰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前 言

本书详细记载 1911—1949 年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成就,是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具有文献性、工具性和学术性。

本书按照每年传记评论、单篇传记、传记著作、卒于是年的传记作者的顺序进行著录,另有编者按语插入每块内容之中。传记评论主要著录传记理论、传记理论翻译、传记作品评价和提出传记理论的序跋等;单篇传记主要著录发表于报纸杂志的各种传记作品和传记资料等;传记著作主要著录各种出版机构出版的长篇传记和汇编的短篇传记,以及与传记有关的著作等;传记作者的卒年介绍,主要介绍卒于 1911—1949 年的有传记作品的文人学者。

因为编年体之缺点,不如纪传体能反映现代传记文学的整体成果,也不如纪事本末体能反映传记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以分板块、加按语、“互见法”来补充,本书在以上四大栏目下都加有按语。按语主要摘录传记理论观点、当时和后代对传记作品和传记作家的评论,补充介绍传记作品或理论文章产生的原委等,以存录史料为主,评论为辅。这一部分既是对所著录的史料的重要补充与诠释,又展示了编者对史料研究方面的一些见解,在编年史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现代传记文学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传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受到西方传记的巨大影响,因此有了崭新的发展变化,为了区别这种变化,胡适先生最早引进西洋“传记文学”概念,将此时的传记统称为传记文学,并予以大力提倡。朱东润先生则认为用“传叙文学”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实际,所以他所写的论著都用“传叙文学”这个名称。另有学者如孙毓棠则称现代的传记为“新传记”。从名称上的变化就已经反映出客观事实,就是现代传记文学与古代传记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梁启超、蔡元培、章炳麟、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林语堂、朱东润、谢冰莹、孙毓棠、沈从文、张默生、吴晗等一大批优秀的传记文学大家,涌现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和《四十自述》、郭沫若的《沫若自传》、郁达夫的《达夫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等大量的传记文

学名著,取得的成就非常巨大。概而言之,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传记形式多样化

现代传记文学按照作者来分,可以分为他传和自传。他人做的传记,包括小传、墓志铭、碑记、史传、行状、年谱、言行录、专传等,这些传记形式,在现代大多仍然存在,不过写法上有的已经发生一些变化;自己写的传记,包括自传(自序、自述和自白)、自传的诗歌、游记、日记、书信、回忆录、自撰年谱,以及口述历史等形式。现代传记在继承古代传记的各种形式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传记形式,如现代派传记、后现代传记与图像传记,传记剧、影视传记等也在崛起之中。还有以白话文短篇小说体形式叙述明朝忠臣义士的《扬州义民别传》,有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介绍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贺龙、叶挺、项英、叶剑英、徐海东等 57 位将领的身世、个性、思想及功绩的《今日的将领》等。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口述传记,如北京大学新潮社编的《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其实就是由蔡元培口述,其夫人之弟黄世晖记录的《蔡元培口述传略》。《李鸿章传》《张居正大传》《朱元璋传》等章回体长篇传记文学的产生,显示了现代传记文学受西方传记影响的明显特征。从此,西式的长篇传记文学形式成为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几乎所有的长篇传记都是分若干个小标题来叙述历史人物的事迹的。

年谱是一种传统的传记编纂体例,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形式,但是胡适在编撰《章实斋先生年谱》时,在体例上却有新的创造,他自己总结说:“我这部《年谱》,虽然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有几点,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几句。凡删节之处,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串,自成片段。这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话,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

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①胡适在传记形式上的创新,是值得肯定的。姚名达在胡适的影响下编撰了《程伊川年谱》《朱筠年谱》《刘宗周年谱》《余姚邵念鲁先生年谱》,并且申明编撰这几部年谱的指导思想,是用“新史学的眼光,作科学的探究与记载”^②,不仅要深刻揭示谱主的主要思想,而且要通过记载谱主的主要活动,搜集和挖掘出谱主的社会交往,从而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思潮的转变,与古代的年谱相比,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姚名达的《余姚邵念鲁先生年谱》采用谱前、正谱和谱后的编纂体例,作者也自认为是一个“创例”。

古代传记都是文字传记,尽管对人物的外貌有所描写,但根据这种描写得到的人物形象却千差万别。譬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孔子的相貌“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③。根据这样简易的描写而画出的孔子相貌,各种各样,以至于外国朋友因此提出了中国的孔子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这样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了避免外国朋友的误会,国家汉办专门弄了一个孔子“出国”的标准像。现代传记则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书写条件的改善,传记写作和发表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现代》《七月》《热风》《小说家》《宇宙风乙刊》《中国文艺》《文季月刊》《文学》《文艺》等许多刊物在发表传记作品时,都配有传主的画像、木刻或照片,如鲁迅逝世后,《文季月刊》在“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发表鲁迅的传记的同时,还发表了《鲁迅先生画像》(遗像)、《鲁迅先生遗体》(照片)、《鲁迅先生书桌》(照片)、《灵柩移上灵车行进中》(照片)、《殡仪行列中之鲁迅先生画像》(照片)、《鲁迅先生长眠之墓穴》(照片)、《许广平女士及公子海婴》(照片)、《鲁迅先生书札遗迹》(照片)、《鲁迅先生遗墨》(照片)等,现在只要说起鲁迅,人们的脑海里立刻就会出现鲁迅那独特的样子,就是因为有鲁迅当时的画像和照片传世的缘故。《现代》杂志在纪念歌德逝世100周年时,甚至发表了一组《歌德的代表画像》,其中包括:(1)歌德一生的肖像:16岁时的画像、25岁时的画像、32岁时的画像、41岁时的画像、50岁时的画像、58岁时的浮雕面形像、60岁时的画像、66岁时的石膏面形像、68岁时的速写像、70岁时的画像、77岁时的画像、79岁时的雕像、80岁时的塑像、83岁时的画像、临终时的画像;(2)环境·人物:歌德父母肖像、歌德之妹肖像、歌德夫人雕像、歌德的佛朗克府故居、歌德时

① 胡适. 胡适文存第2集[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115.

② 姚名达. 刘宗周年谱·自序[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

③ 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05-1909.

代的魏马风景、歌德在魏马的著作室、歌德在魏马的会客室、魏马公爵赠给歌德的别墅、魏马公爵肖像、魏马好友席勒肖像；(3)诗与散文：原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封面、《少年维特之烦恼》插画一页、绿蒂的真面目、歌德的恋人——丽丽夫人、歌德的恋人——玛丽安娜、歌德和魏马公爵、歌德旅行意大利画像、歌德的背影、歌德剪影四帧、歌德创作原稿之一页、老年歌德的手；(4)纪念·展览：歌德的死颜、歌德的绝笔、歌德逝世后的讣告、魏马的歌德墓堂、歌德与席勒之墓、歌德临终的卧室、歌德的遗物——书案、歌德的遗物——旅行箱、歌德百年祭瞻礼、魏马的歌德铜像、歌德代表作的中译本《浮士德》、歌德代表作的中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纪念马克、歌德纪念明信片、歌德纪念邮票、歌德的后裔。通过这些照片和实物，读者不仅对歌德一生形貌的变化有了清晰的印象，而且对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他的亲人和交游，他死后得到怎样的纪念等也都有了一些了解，这对文字传记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这是现代传记文学不同于古代传记的一个显著特点。

古代史传都以叙述为主，间有夹叙夹议的，如《史记·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也是少数，作者的评论一般都放在传末，《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曰”，一部二十四史，除了《元史》外，皆有史传作者的评论，但是这些评论，只是传记正文的一个补充，并不是以评论为主的传记。以评论为主的传记形式，称之为评传，是现代才有的传记体裁。受现代西方传记的影响，经过一番提倡，评传作为一种崭新的传记形式，在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中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称之为评传的作品，如翻译过来的有《马克思评传》《高尔基评传》《安徒生评传》《拜伦评传》《罗素评传》等，描写古代历史人物的有《子产评传》《司马相如评传》《陶渊明评传》《萧统评传》《刘彦和评传》《岳飞评传》《李卓吾评传》《成吉思汗评传》《袁枚评传》《曾国藩评传》等，描写当时作家的有《郭沫若评传》《茅盾评传》《郁达夫评传》《张资平评传》等，描写外国作家的有《王尔德评传》《西万提斯评传》《毛里哀评传》《微尼评传》等。评传的传主已经涉及国内外的各个方面，但以文学家为主，评传已经成为现代传记文学广泛使用的一种传记形式，取得的成就也很显著。

二、传主选择广泛化

古代史传的对象，主要是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和社会名流，一般的人物很难被树碑立传。到了现代，传记文学的写作对象扩大到了各个方面，许许多多小人物都被写入传记之中。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传记》类统计，1912—1949年，出版的传记作品大约1641种，涉及政治、法律、军事、财政、

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医学卫生、农业水利、华侨等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这些方面的传记作品，在本书都有详细记录。就妇女而言，像政治界、军警界、教育界、实业界、工商界、美术界、生活界、交际界、运动界、武侠界、慈善界、释道界、巫医界、优伶界、江湖界、杂流界等各行各业之妇女都有被立传，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出现了妓女传记，最典型如有关赛金花的传记资料数目众多，1934—1939年即有《赛金花》《赛金花本事》《赛金花传》《赛金花遗事》《赛金花自述》《赛金花的一生》《赛金花外传》《赛金花系年小录》等传记资料涌现。

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现代妇女》杂志1943年元旦创刊于重庆，1946年5月迁址上海，1949年3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而被迫停刊。该杂志设有人物传记专栏，共发表了109篇中国近代人物传记。在《现代妇女》所关注的人物中，涉及的传主范围是很广泛的。从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孙中山、慈禧太后，到致力于妇女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李德全、何香凝、胡子婴、倪斐君、秋瑾、徐宗汉、雷洁琼、周颖和谭惕吾等；从抗战英雄朱文央、李林、秦嘉征、蒋鉴、杨福兰、马淑、蔡一飞，到国民党将领胡素；从作家白薇、许啸天、黄氏风姿、冯伊湄、王鲁彦、刘海尼等，到记者彭子冈、张志渊；从演员白杨、吴苗、袁雪芬、张瑞芳、叶露茜、戴爱莲等，到演员母亲周董燕梁；从关心妇女儿童福利的王家珍、姚淑文、刘德伟等，到创办儿童服装公司的实业家丁慧涵；从医生丁懋英、周穆英、苏元悟、蒋鉴琴等，到护士王文理；从公务员之真、白明、易若芸等，到职员何时清、南迎、高山、岚英、曾毅等；从教师成大哥、青果、陶端予、程仲苍、陈品芝等，到学生宋怀玉、辛夷、纪以、赵之巽、赵海伦、村农等；从女工小杨、林宝珍、徐亚兰等，到家庭妇女陈红藻、云露、明沙等；另外还有抗战英雄的家属、图书管理员、书店店员、售票员等等。^①特别是平民传主的大量涌现，使传记文学从鸿篇巨制走向大众化，更接近地气，更利于普及，因而鼓励青年多读传记成为热门的话题。

三、自传创作普遍化

胡适是现代自传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很早就开始逐个劝说当时的名人写自传，在《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说：“一九二七年我在华盛顿第一次劝施植之先生写自传，那时他快满五十岁了，他对我说，写自传还太

^① 于翠艳. 现代妇女杂志有关中国近代人物传记的研究[C]//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371.

早。以后二十多年之中,我曾屡次向他作同样的劝告。到了晚年,他居然与傅安明先生合作,写出他的《自定年谱》作自传的纲领。又口述他的早年生活经验,由安明记录下来。安明整理出来的记录,从施先生的儿童时期起,到一九一四年他第一次出任驻英国全权公使时为止——就是这一本很有趣味而可惜不完全的自传。”^①在所著《四十自述》的自序中,他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最可悲的一个例子是林长民先生,他答应了写他的五十自述作他50岁生日的纪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对我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不幸他庆祝了50岁的生日之后,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龄的战役里,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②与此同时,胡适还先后劝说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梁士诒、张元济、熊希龄、高梦旦、叶景葵等当时的名人撰写自传。因为这些人是现代某个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他们把自己的自传写出来,不仅可以让读者知道他们本身的非凡经历和传奇事迹,而且可以通过他们的事迹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胡适几十年如一日地四处劝导名人写自传,有的答应了,也写出来了,有的答应了,却没有写成;对于没有写成而又不幸谢世的名人,胡适感到无比遗憾。

自从胡适鼓励名人写作自传以来,写自传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胡适自己身体力行,带头撰写了《四十自述》,好像人生逢十是一个关节点,先后写了四十自述的还有林语堂、汪亚尘、郭思绶、庄严居士等,写五十自述的有严竹书、穆湘玥、王晓籟、王静斋等,写六十自述的有石醉六、守培、周越然等,写七十自述的有胡镇、叶为铭、朱少滨等。当时撰写自传的作家有郁达夫的《达夫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巴金的《巴金自传》、许钦文的《钦文自传》、张资平的《资平自传》、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等,其中郭沫若撰写自传时间跨度最长,从192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自传作品,一直写到1945年为止,后来汇集成《沫若自传》,共计110万字,这是现代部头最大的自传,其规模在世界传记文学史上也属罕见。还有艺术家徐悲鸿的《悲鸿自述》、著述家邝富灼的《六十年之回顾》、医学家伍连德的《得之于人用之于世》、佛学

① 胡适,胡适传记菁华下[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437.

② 胡适,四十自述[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1.

家丁福保的《医道与佛法》、足球名将李惠堂的《从母胎到现在》、妇女运动者王立明的《由家庭到社会》、交际家黄警顽的《廿年交际经验谈》等自述文章，都曾在《良友》杂志连续发表过。除了名人写自传外，普通人也开始写自传，像宋维翰《一个士兵的自述》、李会申《一个乞者的自述》、沈翼飞《小皮匠的自述》、汪令仪《一个舞女的自述》等，作者都是平民百姓；张雪岩、刘龄九编的《田家读者自传》曾收录了农民、工人、商人及普通劳动者自传、生活述略100余篇，这些自传为《田家半月报》征稿所得，可了解各地民众生活实况，发现社会问题，供社会学、历史学等专家研究参考之用。

现代自传的兴盛，与报纸杂志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报纸杂志不仅为自传的发表提供了平台，而且许多文学期刊还精心策划一些自传写作题目，鼓励大家撰写。譬如1931年《读书月刊》有“我的读书经验专号”，发表了赵景深、章衣萍、匡亚明、谢冰莹、顾均正等14位作家的读书体会。1932年《文学月报》策划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和“一·二八事变”“九一八周年”专号，发表了白薇、洪深等人的自传和沈端先、洪深、叶圣陶、茅盾、柳亚子、田汉、穆木天、楼适夷等人在战乱中的经历。1935年《文艺》杂志策划了“作者自述特辑”，发表了胡怀琛、李金发、顾仲彝、王任叔等12位作家的自述；1936年该刊又策划了“我创作的动机特辑”。这方面成绩显著的是《青年界》杂志，该刊物于1935年策划了“学校生活之一叶特辑”，发表了陈友琴、钱歌川、郑师许、刘大杰等45人回忆学校生活的文章；1936年又策划了“我的职业生活特辑”和“中学生毕业后就职实况特辑”，前者发表了李长之、臧克家等92人回忆自己职业生活的文章，后者发表了梁燕、徐天武等11人回忆中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该刊这一年的“暑假生活特辑”，发表了杨东莼、胡行之等93人回忆自己暑假丰富多彩生活的文章；1937年，该刊又有“青年作家指导特辑”和“日记特辑”，前者发表隋树森、朱雯等57人的创作经验，后者发表吴景崧、周作人、老舍、艾芜等121人的日记。此外，《抗战文艺》有“轰炸特辑”，《文艺春秋丛刊》有“生活回顾特辑”，《论语半月刊》有“癖好专号”和“逃难专号”，这些特辑和专号，发表的都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断，但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不仅从中可以看见作者的情感，而且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

四、传记思想个性化

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都是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and 感情的。胡适是“自由主义者”，他力图打破旧的束缚，肯定个人自由与自我追求。在传记领域，这

种大胆的个性追求、自我表现与暴露、自我批判和忏悔意识是中国现代传记的特色。像郁达夫发表于1927年的《日记九种》，是现代知识分子创作的第一部作者在生前就公开发表的私人日记，而且是个人婚变的日记，特别是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与王映霞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甚至情欲，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顾忌地暴露于众，庶几可以与卢梭的《忏悔录》媲美；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作者“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他在监狱里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分析，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曾经的一个领导人，敢于把自己的思想变化赤裸裸地加以交代，是要勇气和胆量的；其他如张默生写《异行传》，是为了“抒泄抑郁的情怀”，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希望用张居正的“把整个的生命贡献给国家”的精神，来激励抗战时期的政府和人民，如此等等。每位作家创作的传记作品，都是表达了作者的一定时期的思想的，个性化色彩非常浓厚。郭久麟在《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第五章“五四以后的自传文学”中说：“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自传可以分四类：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我暴露型，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自我张扬型，以瞿秋白为代表的自我剖析型和以谢冰莹为代表的自我倾诉型。”^②从自传写作的个性化，可以窥见现代传记文学的个性化色彩是多么明显，反映了现代传记文学百花园的多姿多彩。

五、传记语言通俗化

五四运动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现代传记文学冲破了传统的模式和文言文的桎梏，形成了新的现代体式和白话文，传记文学的创作通俗易懂，促进了传记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胡适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他提出了“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的主张，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说：“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285。

② 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54。

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①胡适还把这种主张也运用到传记文学的写作上来,因为他觉得“死文字”无法承担新传记描写人物的任务。他论述道: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因为这几种原因,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②

胡适认为,古代之所以缺乏生动传神的人物传记,就是被死文字、烂古文给害的,他深深觉得,古代的“死文字”已经无法胜任新传记要传神写生的任务,不可能写出“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而让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尤其是时代发展到了现代,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如果语言文字不变的话,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已经势在必行,变革已经时不我待。当张謇的儿子用白话文为其父亲作传时,得到了胡适的大力赞赏,并欣然为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说:“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决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谱》和我的《章实斋年谱》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牍来做传记的材料,总期于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③胡适自己也率先垂范,撰写了《白话文学史》,出版了白话诗集《尝试集》,更主要的是用白话文完成了《四十自述》《李超传》《追悼志摩》等语言自然流畅而感人肺腑的传记作品。胡适关于中国文字的障碍,是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的论述,得到了朱东润、郑天

① 胡明. 胡适精品集第11册[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48.

② 胡适. 胡适传记菁华下[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462.

③ 胡适. 胡适传记菁华下[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463.

挺等学者的赞同,郑天挺在《中国的传记文》中说:“后来传记所以不好的原因,大概有下列几点:第一,由于文字本身。古人言文一致,所以写下来的文字就同语言一样。后来文字与语言越离越远,拿古代的文字语法写后世的语言,所以语气神情不能充分表现。传记作者既不肯用当时的语法和习惯的词句来写当时的事情,记当时的对话,还要去学那更古的语法,用那早不通行的字句,以自诩古奥,于是越学越坏,越不近真实情况。”^①王治心、李次九等人在编撰《中国历代名人传略》时,已经非常明确地把“文字通俗”作为编撰要求之一。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和语言大众化、语言民族化运动的展开,白话文得到了广泛普及,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可和接受,传记文学的白话文写作也迅速普及,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都是用白话文写作的,文言文传记终于逐渐告别了现代传记文坛。

六、传记译介全面化

现代传记文学之所以能迅猛发展,与西方传记文学的传入和影响密切相关。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随着卢梭的《忏悔录》、普鲁塔克的《传记集》、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以及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和传记理论传入中国,中国传记作家获得了新型传记文学创作的样板和理论武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传记文学大家都力图在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记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的传记文学理论,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体系和理论体系。

为了更好更多地借鉴外国传记文学的创作,一时间译介外国传记作品和传记理论成了一种风气,全面展开,具体表现在:一是各种文学期刊和非文学期刊,都发表外国传记文学翻译作品,甚至一些重要的大型报纸,也发表外国传记作品。二是各类出版机构大量出版外国传记文学著作,如《马克思评传》《康德生活》《达尔文生活》《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创作》《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爱迪生的奋斗史》《歌德自传》《林肯传》《罗斯福传》等单个传记和《近代欧美哲学家》《世界革命妇女列传》《世界名人传》《世界电影明星小史》《世界昆虫学家传略》等综合性传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三是涉及的国家众多,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几十个国家的传记文学名著都先后被译介到国内,尤其是一些弱小国家传记的翻译介绍,体现了中国传记文学翻译者对世界弱小各国的重视和尊重。四是编译外国传记,如刘麟

^① 胡道静,《国学大师论国学(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39.

生编译的《世界十大成功人传》，介绍了乔治·皮博迪、瓦特、乔赛亚·梅森、贝尔纳·帕利西、法拉第、埃兹拉·康奈尔、爱迪生等 10 人的生平事迹；陈家骥、陈克文编译的《世界著名探险家》，介绍了马可·波罗、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德雷克、安森、库克、利文斯敦、斯坦利、约翰·卡伯特、雅克·卡蒂埃、约翰·戴维斯、马丁·弗罗比舍、斯特尔特、亨利·赫德森、约翰·富兰克林、乔治·内尔斯、南森等人的探险事迹。编译的长篇外国人物传记有邹宏道的《高尔基评传》、石苇的《萧伯纳》、伍况甫的《爱迪生传》等。五是除了翻译、编译之外，中国传记家还以外国传主为主创作了许多外国历史和现实人物的传记。如沈雁冰、郑振铎撰写的《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就包括现代犹太文学者宾斯奇、海雪屏、考白林、阿胥传略和现代匈牙利文学者莫尔奈、海尔齐格传略，还有现代南斯拉夫文学者柯苏尔、科洛维支传略和现代波兰文学者布什比绥夫斯基、莱蒙脱、推忒玛耶尔传略，以及现代捷克文学者白土洛支、白息那、斯拉梅克、马哈、齐拉散克、沙伐、捷贝克传略等；高觉敷的《心理学名人传》，乃西方近代心理学名人传略，其中有陆克、柏克烈、休谟、哈德烈、培固、费希纳尔、布连搭等 18 人的传略；长篇外国人物传记有郑振铎的《泰戈尔传》、张资平的《地质学者达尔文》、顾均正的《安徒生传》、沈端先的《高尔基评传》等。六是翻译介绍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如戴榴龄的《近代英国传记的简洁》和《谈西洋传记》、范存忠的《一年来英美的传记文学》、任美镠的《莫洛亚著传记文学两种》等文章，都是评介西方传记作家或作品的重要文章；像周骏章译的《论传记文学》《论传记与自传》《传记的作法》《论英国传记家斯揣齐》，白桦译的《传记文学论》，许克之译的《传记的艺术》，王卢译的《论传记艺术》，黎生译的《现代的传记文学》，常风译的《小说与传记》，今纯译的《写传记的经验》，坎侯译的《传记学的科学的研究》等论文，都把西方传记家的重要传记理论介绍到了国内，使国内传记文学作家及时掌握了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并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创作实践。

七、传记理论研究系统化

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胡适是第一个提倡“传记文学”概念的，他不仅身体力行从事传记创作，而且积极从事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在他的倡导下，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郁达夫有《传记文学》与《什么是传记文学》，简略介绍了西方传记文学作品和理论；朱东润有《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与人格》《传记文学之前途》等文，介绍西方的传记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毓棠有《传记与文学》一书，其中的《论新传记》和《传记

的真实性和方法》，比较完整地归纳了西方传记理论家的理论主张；此外，刘锡基的《传记文学之建立》、许寿裳的《谈传记文学》、汤钟琰的《论传记文学》、易如的《谈传记文学》、林国光的《论传记》、杨振声的《传记文学的歧途》、寒曦的《现代传记的特征》和《如何选择传记人物》、湘渔的《新史学与传记文学》、朱晨的《我生平所最爱读的书——传记》、陈友三的《青年与传记》、陈训慈的《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胡哲敷的《传记与社群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上的地位》、杨华同的《论教育传记》、伯奋的《关于文学家传记电影》等论文，都是当时重要的传记文学理论文章。这些传记文学理论文章，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里无法展开论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一是传记名称问题，胡适称“传记文学”，朱东润称“传叙文学”，孙毓棠称“新传记”，目的都是为了区别于古代传记。二是传记分类问题，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法。三是中国的传记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问题，胡适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①四是传记真实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意见比较统一，都一致认为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只有真实的传记才是有价值的传记。五是现代新传记的写法问题，主张学习西方传记文学的优点，采取心理分析的方法，把人物性格写活。六是自传写作问题。面对自传创作的繁荣和作者的平民化，有的学者开始反思，杜若认为：“自传不是人人可写，不是人人应该写。你没有丰富的生活，你能教给读者什么？你没有独特的心得，你能够帮助读者什么？”^②周越然也认为：“倘然写自传的目的，必在教导后人，那末，年轻无经验可言者，不必写自传；年老而言不正，行不端者，亦不必写自传。”^③七是传记名作的评价问题。如胡适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和朱东润的《论传叙文学底作法兼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就是对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优劣的评价。八是鼓励青年阅读传记问题。青云梯《伟人传记与青年》和钟子岩《传记与青年》，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代表性论文。九是传记的教学问题。胡哲敷的《传记与社群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上的地位》、杨华同的《论教育传记》和陈训慈的《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都专题讨论了这个问题。十是现代传记文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前途问题。杨振声的《传记文学的歧途》和朱东润的《传叙文学底前途》是其代表。十一是西方传记文学对中国现代传记的影响问题。苏雪林说：“最近十年，德国卢德伟格、法国莫尔亚斯、英国施特拉

① 胡适.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J]. 吴淞月刊, 1930(4): 24.

② 杜若. 自传年[J]. 一周间, 1934(3): 107.

③ 周越然. 何必自传[J]. 文友, 1943(7): 2.

齐,不约而同地努力创造了一种新传记文学,那便是用写小说的笔法来做传记。据说卢德伟格的《歌德传》,又名《一个人的传记》,莫尔亚斯的 Ariel 和 Beethouen,施特拉齐的 Eminent Victorians Queen Victoria 都是富于小说戏剧性的传记。中国则二十年前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也可以说是半小说的体裁。今日闻一多的《杜甫》虽则才写了一个开端,但我们可以看出它感染了不少西洋新传记文学的作风的影响。”^①陈定阁也说:“中国始终没有一部新的传记文学产生出来。有,现在有了,《张居正大传》在这方面的意义上说,是具有新姿态新价值的。它具有中国史传的特长:资料严谨,态度慎重;但他也具有近代西方传记文学的优点,描写鞭辟入里,真正能把握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此非中西文学都有修养的是不易做到的。”^②可见闻一多的《杜甫传》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他们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受到了西方传记文学的一定影响的。这一点,朱东润先生自己也直言不讳,他在《张居正大传序》中说:“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底《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底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③朱先生为现代传记文学所做的披荆斩棘的工作,是有开创性的。

除了单篇传记文学理论文章之外,这时期王元的《传记学》和沈嵩华的《传记学概论》两书的问世,把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特别是“传记学”概念的提出,直接把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是前所未有的,意义十分重大。

王元的《传记学》一书于1938年出版,全书概述了西方和中国传记文学的沿革发展的历史,介绍了传记的种类,分析研究了写作传记的必备条件和各类人物传记的写作方法,同时还研究了传记与史学、文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在谈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时,王元指出:

传记中所传的人物,最紧要的地方,是要能够描写出它的实在的姿态,实在的精神,实在的口吻,实在的言行思想,实在的声音笑容,实在的性格趣味,以及实在的周围环境。凡是写作传记的人,对于所传的人

① 苏雪林. 自传文学与胡适的《四十自述》[J]. 世界文学, 1934(2): 357.

② 陈定阁. 评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J]. 中央周刊, 1946(8): 488.

③ 朱东润. 张居正大传序[J]. 国文月刊, 1944(28): 19.

物,应该保存一种敬爱和理解的态度,以及同情的心理,不应该出之以物质的报酬,或金钱的买卖,应该直陈事实,不应该阿谀献媚,一定要做到活生生地把每个人物的弱点和缺点,通通能够刻画出来。否则,至少也必得像《檀弓》一样,赤裸裸地把孔子的不知父墓在哪里,都全盘烘托出来,真切的宣示于人。

中国过去的传记作家,在史书里面的史传,他们对于所传的人物,在求真的方面,自是下了不少的工夫。他们写起传记来,都是异常的审慎,异常的小心。他们尽量的征求异说,尽量的采集史料。但是,他们绝不马虎,绝不苟且。对于一切事件,都要去辨别它的真伪,都要去追寻它的真实性。因为必须做到这样的地步,才能够成为“一家之言”,才能够取信一时,“扬名千古”。这是他们写传记文学的最高理想,也是他们所当自负的责任。所以他们在写作传记的时候,注全力于求真。他们坚决地反对不正确的“苟求异端,虚益事实”;他们坚决地反对漫无选择的“务多为美,聚博为功”;他们尤其坚决地反对“固造奇说,妄构史实”。所以他们对于史料的来源要追求,对于传记的真伪要辨证,对于事实的先后要注意。一本书靠不住,他们绝不引;一件事有可疑,他们绝不引;一种传说有矛盾,他们绝不引;一种传闻是出于远道敌国,他们绝不引;一种奇说为事理所必无,他们绝不引。总括的说一句,他们绝不使“异辞疑事,远诬千载”。

因为过去中国的传记作家,其态度既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丝毫不苟,所以他们在叙述的时候,往往就发生了许多禁忌的事情。第一,他们“忌诡异”:凡是神怪不经的传说,纵然在书籍中确有这样的记载,也不必把他写入传记。例如说一位帝王,载一位名臣,生时有什么祥异,死时有什么征兆,这完全是极可笑的神话,或附会。所以布满这样记事的沈约《晋书》,便引起刘知幾的不满,和强有力的攻诋。但是,这种毛病,一直到了清朝人的传记中,仍然是琳琅满目。第二,他们“忌虚美”:对于一个人的过分称赞,或者对于一件事的过分夸张,那完全是不妥当的,尤其是要把他写入传记里面,更是不应该的。比如《北齐书·王琳传》说他“既及于难,当时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者,莫不为之嘘唏流涕”;又如《东观汉纪》说“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这样虚构太过,夸张太甚,至今仍被人传为口实。第三,他们“忌曲隐”:一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作事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在传记里面完全应该把它叙述出来。不应该只述其善的,而曲隐其恶的。但是,历代的传记作家们,或